

# 福康安征剿廓尔喀及其对西藏的治理

周 燕

(西藏大学 文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 乾隆五十六年, 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为了彻底打败廓尔喀, 实现永靖边隅的目的, 乾隆皇帝派遣福康安入藏征剿。福康安临危受命, 不畏艰险, 驰赴西藏, 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 迫使廓尔喀纳贡称臣; 而且在战后又制定《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厘清弊政, 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乾隆; 福康安; 廓尔喀; 西藏

[中图分类号] K249.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4-0100-05

## Fu Kang'an's Suppression of the Gurkha and His Governance to the Tibet

ZHOU Yan

(College of Humanity, Tibet University, Lasa 85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fty-sixth year of Qian Long period, Gurkha invaded Tibet twice. Qian Long Emperor sent Fu Kang'an to Tibet to suppress Gurkha in order to beat it completely and achieve his aim to set Yong Jing as an important border area. Fu Kang'an shouldered the task, and went to Tibet without fear of danger and difficulty. He not only gained brilliant military achievement as a result of seven victories, with the ambassador of Gurkha forced to be a minister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set *Twenty Nine Aftermath Articles for Tibet Made by Imperial Order*. At the same time, Fu Kang'an corrected the maladministration so as to lay a firm foundation for Tibet's lasting political stability.

**Key words:** Qian Long Emperor; Fu Kang'an; Gurkha; Tibet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廓尔喀因西藏聂拉木等处第巴“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以及新旧银钱折算等方面对西藏当局不满, 在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的挑唆下发动侵藏战争, 相继占领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济咙、聂拉木和宗喀三地。乾隆皇帝积极调兵遣将, 要求对廓尔喀大加惩创, 以达到永靖边隅的目的。但办事大臣巴忠等人欺下瞒上, 最终以西藏地方每年向廓尔喀支付300元宝的“赔银赎地”达成和议, 草草了结第一次廓尔喀侵藏战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廓尔喀人因为索取第一次战争赔款无果, 再度入侵后藏, 并很快攻陷

后藏政治、宗教中心扎什伦布寺, 是为第二次侵藏战争。由于在藏官员办事不力, 而派遣赴藏戡乱的总督大员也敷衍塞责,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厘清西藏弊政, 乾隆皇帝决定派遣福康安入藏征剿廓尔喀。

### 一 临危受命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初, 廓尔喀悍然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八月底, 战事讯息报知朝廷, 而办理第一次廓尔喀侵藏事务的主要官员巴忠闻讯后竟然投河自杀。乾隆皇帝陡感事态严重, 一面要求彻查

收稿日期: 2014-03-25

基金项目: 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宗教政策研究”(13BMZ002)

作者简介: 周 燕(1974-), 女, 四川成都人, 西藏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藏族史研究。

第一次办理该事务的官员,一面命令四川总督鄂辉亲赴西藏、平定战事。因为“鄂辉声名较大,成德人稍粗率,未经历练,应令鄂辉前往为妥。”<sup>[1]78</sup>但鄂辉对赴藏戡乱并不用心,认为此次战事只是西藏地方与廓尔喀之间的债务关系所系,是两部番人之间的事务,“只须查照夷务之例遣员前往驾驭剖断,自可完结。”<sup>[1]80</sup>并认为西藏战事可能是“唐古忒人等惊惶张大之词”,<sup>[1]80</sup>故只是命令成德带兵前往,而自己坐镇成都指挥。乾隆皇帝对鄂辉的行为大为不满,命军机大臣传谕鄂辉:“朕以此事系鄂辉承办,已降旨仍著鄂辉前往。今据鄂辉、成德所奏,仍遣成德办理。鄂辉受朕深恩简用总督,廓尔喀之事又系鄂辉初时办理不善,以致滋事,何尚观望不前?……鄂辉过于拘泥,著严行申饬。”<sup>[1]81</sup>但鄂辉仍然推诿不前,称“协噶尔以外到处荒山,柴草不出,人烟绝少,廓尔喀番人等虽占据定日,别无抢掠之处,断难久住。目下节届秋中,该处已经下雪,山路陡滑,据保泰调派唐古忒、达木番兵二千名在各要隘悉力防守,谅该番等亦不敢再行深入。”<sup>[1]84</sup>乾隆皇帝得此鄂辉奏言,再次谕令军机处严行申饬:“鄂辉惟知自图安逸,畏事脱身。伊受朕厚恩,简任总督大员,若如此畏葸自安,只为人往来传递文书,又安用此总督为耶?”<sup>[1]85</sup>在乾隆皇帝的一再督促下,鄂辉九月初六才启程赴藏。但是,鄂辉到藏后,仍然罔闻战事,在九月二十八的奏言中仍称此次廓尔喀侵藏责任主要在西藏当局:“一因唐古忒拖欠银两催取起衅,一因廓尔喀新铸银钱唐古忒未照定议行用,以致构怨动兵。”<sup>[1]111</sup>并声称只要偿还欠债,按照廓尔喀人的要求换用新钱,廓尔喀人就将“感激恐惧,不致再生事端。”<sup>[1]112</sup>鄂辉明显偏袒廓尔喀人。而且鄂辉还称如果出兵征剿廓尔喀,路途遥远,粮食转运维艰,乌拉牲畜都会有困难,建议“不值大用兵。”<sup>[1]112</sup>乾隆皇帝严厉斥责鄂辉“不免有仍前畏难、将就了事之见”。<sup>[1]113</sup>

而西藏战事却越来越严重,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廓尔喀侵藏的战况再次传到朝廷,后藏战事吃紧,廓尔喀军队不仅占据济咙、宗喀和聂拉木边境三地,竟然将火烧至后藏政治宗教中心扎什伦布寺,并将扎什伦布寺抢劫一空。得此讯息,乾隆皇帝大为震怒,称“至贼匪来藏侵扰,若不过因索欠起衅,在边境抢掠,原不值兴师大办。今竟敢扰至扎什伦布,则是冥顽不法,自速天诛。此而不声罪致讨,何以安边境而慑远夷耶?……况该处为

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地,蒙古番众素所崇奉,若任小丑侵凌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徼外么麽不加撻伐?”<sup>[1]140-141</sup>

鄂辉对战事不用心,而在西藏的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等人也是遇事张惶无措。面对廓尔喀第二次入侵的来势凶猛,扎什伦布寺被劫,唐古忒人心涣散,保泰、雅满泰却向朝廷奏言:“或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移于泰宁或移西宁之处。”<sup>[2]677</sup>得此奏报,乾隆皇帝大怒:“保泰、雅满泰二人,不料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竟是无用之物,督乱已甚。”<sup>[3]1212</sup>考虑到西藏的政事与战事都很复杂,而地方大员却敷衍塞责,不堪大任。为了平定战事,乾隆皇帝不得不考虑更换人选,于九月二十五日当天旨召福康安来京备用。后经“再四思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正式决定派遣福康安到西藏平定战乱。因为“福康安素娴军旅,识见较鄂辉为优。且奎林系福康安堂兄,平日尚称友爱,令其同办军务,想能和衷协办,迅速成功……著传谕福康安,接奉此旨,即趲程迅速来京,候朕面授方略。”<sup>[1]109-115</sup>接到乾隆皇帝赴京备用的谕旨后,福康安火速赶赴北京。十月二十九日,福康安自北京出发,走青藏路赴藏。

乾隆皇帝对福康安入藏戡乱寄予厚望,并委以重任。先是在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癸酉任命福康安为将军:“廓尔喀贼匪滋扰后藏,现派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等,统领劲兵进剿,以期迅奏肤功。福康安著授为将军,海兰察、奎林著为参赞。”<sup>[2]681</sup>在福康安到藏后不久(乾隆五十七年三月癸未),乾隆皇帝又将福康安擢升为大将军:“福康安统领大兵剿办廓尔喀贼匪,特授为将军,与外省驻防将军体制、称谓相同,究觉尊威莫辨。此次福康安应称为大将军,遇有檄谕行文等事,竟以大将军列衔,更觉威严尊重,足使番众生畏,贼匪破胆。”<sup>[3]1268</sup>福康安此时军功未立,就被乾隆皇帝授予大将军衔的尊贵称号,实属罕见。因为在乾隆皇帝时期从未授予统帅“大将军”衔的先例,而在此之后也再无人获此殊荣。乾隆皇帝对福康安的倚重可见一斑。

## 二 征剿廓尔喀

1. 不畏艰难,驰赴西藏。清代从北京入藏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走川藏路,即经四川入藏,一

是青藏路,即经青海西宁入藏。北京经四川到拉萨约13000里,北京经青海到拉萨约8800余里。虽然青藏路距离较短,但由于此路出西宁后大多地处高寒缺氧地区,人烟稀少,冬季不少地方大雪封山,更非进藏的首选路线。但由于乾隆皇帝对廓尔喀侵藏战事倍感焦虑,希望福康安尽早赴藏处置,考虑到“福康安此次赴藏由西宁出口,程站较近,比之从打箭炉行走可早到二十余日。”<sup>[1]161</sup>所以决定让福康安在严冬之际从青藏路驰赴西藏。“朕为办理廓尔喀之事宵旰焦劳,此时令福康安昼夜遄行,计限四十日抵藏中,将彼处情形速为奏闻,朕心始得少慰。”<sup>[1]173</sup>

福康安深谙乾隆皇帝对藏事的关切之心,慨然领命,轻装简从,决定从青藏线入藏。但是,陕甘总督勒保很快奏报,称“青海口外具系草地,并无树株。今时值隆冬,冰雪甚大,马草、牛粪均被雪压,炊爨维艰……缺乏马草难以趲行。”<sup>[1]193</sup>接此奏报,乾隆皇帝“览奏又增焦虑”,<sup>[1]194</sup>以非常矛盾的心情传谕福康安:一方面对福康安寄予厚望,希望他不畏艰难,仍然经青藏线驰赴西藏:“福康安受朕重恩,又正年富力强,素性奋勉,岂有海兰察等能行之路,而福康安转不能前往之理?”<sup>[1]195</sup>一方面又体恤青藏线难走,所以也不强人之所难:“若青海一路实有万难行走之处,而福康安不肯遽行直陈,临期或致耽误,是欲速反迟,于此事大有关系。今竟交福康安与勒保二人面为熟商,主持定见,且勿游移两可。”<sup>[1]195</sup>

福康安在赴青海的沿途接到不少关于西藏战事的奏报,对乾隆皇帝忧心战事的心境感同身受,“臣恨不奋飞到彼,将确切情形及筹办各事早奏一日,即可早一日仰纾圣怀。”<sup>[1]197</sup>在得到乾隆皇帝西宁至西藏道路艰险的谕令时,福康安已将至西宁。虽然明知前途艰险,但是,还是向乾隆皇帝奏言:“臣仰蒙委任,断不敢轻信人言,稍存畏难避险之见。”<sup>[1]206</sup>十一月二十三日,乾隆再次谕令福康安“若实有难行之处,当即改道由四川赴藏,不可勉强,以致欲速转迟。”<sup>[1]209</sup>

而福康安却决心坚定,回奏乾隆皇帝:“臣蒙圣恩,委以军旅重任,宁敢稍惮艰辛,转生退怯……臣再三详察情形,仍以由青海一路前往为是……出口后自当倍加电勉尽力趲行,以期早至西藏,预筹进剿。”<sup>[1]224-225</sup>乾隆皇帝得此奏言,十分欣慰,盛赞福康安“素性勇往急公,能耐劳苦,虽有旨令其酌商改

道,而福康安仰体朕早夜焦思,欲早得卫藏实在情形方慰廑注……与朕心适相符合,实能仰体朕怀,克副委任,嘉慰不可言喻。”<sup>[1]234</sup>福康安出口后不久,奏称西宁一路“地势渐高,山上旧存积雪,微觉崎岖,并有山岚瘴气,早晚行走,每至致头晕气喘。”<sup>[1]246</sup>得悉此情,乾隆皇帝十分牵挂,“特解亲佩荷包一个以赐,用示优眷。”<sup>[1]248</sup>

正是由于福康安的不畏艰险,自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一自西宁出口,于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抵达拉萨,除去前后耽延11天外,实行39天,全程共计4600里。而此行程“喇嘛等行走总须一百二三十日,不能如此迅速。”<sup>[1]343</sup>对此结果,乾隆皇帝十分满意,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辛卯,再次颁布谕旨恩赏福康安,称“福康安此次统兵进剿廓尔喀,由青海一路驰赴西藏,冲寒跋涉,朕心深为廑念,且道路遥远,所有沿途犒赏不无需费,著加恩于藏内军需银两内赏给银一万两,以备犒赏而示体恤。”<sup>[3]1258</sup>

2. 睿智勇猛,破境逼降。乾隆皇帝对福康安赴藏戡乱寄予厚望。不仅授予福康安前所未有的大将军衔,委以重任,同时也给予福康安极大的信任,多次授予他可以依据战事需要,不经请示、灵活决策和处置的权力。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福康安初到西藏,乾隆皇帝就谕令福康安“所有藏内应办事件谅俱料理妥协,无须朕一一指示。”<sup>[1]306</sup>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福康安既经朕委以军旅重寄,全仗伊调遣主持,不必拘泥请旨,以致往返稽迟。”<sup>[2]1270</sup>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又颁布谕旨,称“朕远在万里之外,不能一一遥为指示。福康安受恩深重,历经委任,不肯畏难迁就,惟在临机应变,通盘筹画,斟酌悉当,妥速藏功也。”<sup>[1]597</sup>而且,为了彻底打败廓尔喀人,乾隆皇帝在经济上也大力支持福康安。一共由户部拨银670万两,用于军饷、奖赏和购买粮食、牛羊马匹等军需用品。

但是,福康安率领从千里之外调遣赴藏的军队,与以逸待劳的廓尔喀军队在高寒缺氧的地方战斗也并非易事。在进攻擦木过程中,考虑到地势险峻,敌人居高临下,福康安等人决定在雨夜偷袭。“远瞰封泥之固,预搜伏莽之戎……斧魂莫窜,刃血争飞,奔走既穷,阻隘斯克。”<sup>[4]127</sup>结果全歼廓尔喀守军,首战告捷。而在济咙之战,“自丑刻进兵直至戌刻,我兵攻战一日,人人鼓勇,午后密雨半日,官兵冒雨围攻,倍加振奋,并未稍形疲乏。天色向暮,

雨益倾注,本应该令各兵略为休息,但当屡胜之后,正应乘此锐气将济咙立时克复,未便予贼以修备之暇,因复催兵连夜进攻,至亥刻将官寨东北隅攻破。”<sup>[1]527</sup>从而将廓尔喀军队赶出国门。

为重创廓尔喀军队,迫使其不敢再挑事端,福康安又率军深入敌境。在进攻廓尔喀境内第一要隘热索桥战役时,道路十分艰险:“危峰崩崖,密箐阴森,毒雾涨空,惊涛殷壑。马悬蹶而不上,鸟戢翼以争迥。贼众负巉岩,阻深溪。”<sup>[4]128</sup>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清军“缚筏竞渡,壬子克之。”<sup>[4]128</sup>打开了进入廓尔喀的门户。虽然进入廓尔喀境的作战条件越发艰苦,但清军仍一路势如破竹。诚如福康安所言:“臣等仰仗圣主天威激励将士,巴图鲁侍卫官兵等争先用命,搭桥过河,于峭壁悬崖、深林密箐、人迹不到之处,黑夜冒雨攀援登陟,衣履皆穿,手足擦破,并未稍形退怯,实为奋勇出力。臣等惟有带领劲兵直前攻剿,迅扫贼巢,以期早慰圣怀。”<sup>[1]548</sup>

在福康安正确指挥,海兰察等将领身先士卒带头杀敌的垂范下,清军勇猛攻战,取得七战七捷的佳绩,“深入贼境者七百余里,俘擒斩获凡三四千计。”<sup>[4]130</sup>并逼近廓尔喀首都,迫使廓尔喀遣使乞降,将被其掳掠的西藏噶伦等人送归,退还所抢劫扎什伦布寺的金银器物,贡献象、马等方物无数,并与福康安立下誓约:“毋敢再犯藏界,永为不侵不叛之臣。”<sup>[4]130</sup>对此结果,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对有功人员进行大肆封赏,特别是对福康安恩赏有加:授其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封领侍卫内大臣,两广总督,一等忠锐嘉勇公、一等轻车都尉,在紫光阁“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中位列第一。而且,乾隆皇帝认为用官爵尚不足以酬其功劳,本想将福康安封王;而封王又怕世人闲话富察氏一门太盛,所以特恩准福康安“将来总督任内,业已降旨照王公名下亲军校之例,赏给六品顶带蓝翎三缺,令福康安于伊得力家人内酌量给戴,用昭格外加恩优眷劳臣至意。”<sup>[1]699</sup>

可以说,正是乾隆皇帝的倚重、信用和支持,再加上福康安的睿智、勇猛和清军的不畏艰难,最终赢得第二次廓尔喀战争的彻底胜利。

### 三 治理西藏

廓尔喀人两度入侵西藏,暴露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首先是驻藏大臣权责不清。正如乾隆皇帝在

第一次战争中给新任驻藏大臣舒濂的谕旨中所称:“从前藏内补放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及一切地方事务皆由达赖喇嘛、噶布伦等办理。钦差大臣全不留心经管,惟知崇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sup>[5]</sup>而驻藏大臣也是人浮于事,“不过迁延岁月,冀图班满回京,是以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sup>[1]624</sup>

其次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活佛转世制度弊端明显。清朝改变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多封众建”的政策,转而支持格鲁派在西藏的优势地位,使得格鲁派一派独大。格鲁派各大活佛权势、影响较大,利益突出,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各大活佛“转世”也受到个别世家大族的操纵,以致出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袭官职袭替相似”的现象。<sup>[3]1360</sup>

第三、西藏地方官员国家主权意识不强。由于西藏位置边陲,与尼泊尔、印度等国相邻,相互宗教、经济联系紧密,人员交往频繁,从而导致一些僧俗大员习以为常,并未将西藏地方与相邻外国的交往严格管控。有些大员甚至将西藏与廓尔喀一样作为清朝藩属国对待。如在第二次廓尔喀战争期间,成德、鄂辉在奏报中就称“唐古忒与廓尔喀均为天朝属番,今不过两处番人交相争攘,何值遽起兵端。”<sup>[1]80</sup>又如货币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专有的流通货币,但在西藏地方,廓尔喀的钱币却长期在西藏社会流通,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而第一次廓尔喀侵藏的原因之一便是廓尔喀新旧钱币在西藏的兑换产生矛盾,但一些办事大员却对货币权不以为然。如鄂辉认为“今巴勒布所铸新银钱用好银铸造,并不搀铜。”<sup>[1]111</sup>并要求西藏地方接受廓尔喀不合理的银钱换算。而乾隆皇帝却认为“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必转用外番货币。”<sup>[1]112</sup>

总之,在两次廓尔喀侵藏战争中暴露出西藏地方治理方面的种种弊端,乾隆皇帝也多次谕令福康安在彻底打败廓尔喀人,永靖边隅的同时,还应借此机会,整顿臧政:“此系极好机会,皆赖上天所赐,福康安等当趁此将藏中积习湔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方为妥善。”<sup>[1]697</sup>针对两次廓尔喀入侵西藏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福康安与孙士毅、和琳等人通盘筹划,制定

善后章程。“臣等将一应章程逐细确商,通盘筹画,务期绥靖边隅,行之久远。”<sup>[1]678</sup>由于有乾隆皇帝的直接指导,再加上福康安等人细心筹谋,所以,在福康安自后藏返回拉萨后,就善后藏政的措施逐一上奏朝廷,除了少部分有修改外,大多照准,最后汇编成《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施行西藏地方。善后藏政的措施涉及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对外交往等诸多方面。

政治方面:完善驻藏大臣体制,明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驻藏大臣权责:“藏内诸事应统归驻藏大臣管理也……其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sup>[2]788-789</sup>“藏内大小番目缺出应行定立等级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也”;<sup>[2]788-789</sup>“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族属一概不准管事以杜弊端也”;<sup>[2]791</sup>“驻藏大臣每年应亲身巡查边境,以重地方也。”<sup>[1]741</sup>并加强驻藏大臣衙门机构设置,如“驻藏文员应请添设”“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员酌定听差兵丁数目以实操防”等。<sup>[2]792</sup>

宗教方面:为了防范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活佛的转世受僧俗贵族操纵,在不改变传统的前提下,决定在西藏推行金瓶掣签制度。“因制一金本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等乎必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入于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签掣,以昭公当。”<sup>[3]1360</sup>从此以后,凡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通过金瓶掣签来选择,以杜绝“世袭嘱托私弊”<sup>[3]1344</sup>,保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在转世上的相对公平性,同时也强化了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制度方面的权威。

军事方面:加强西藏军队的建设。针对之前西藏军民不分,兵民怯弱等弊病,福康安等人提出在西藏建立常备军,并明确兵丁专责,规范钱粮、武器及一些军事纪律,严禁袭充番目之弊,任人唯才,“明示劝诫,庶可武备修明,人知奋励。”<sup>[2]785</sup>

外交方面:加强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的决定权。“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外番通信,应告知驻藏大臣详细商酌也。”<sup>[2]796</sup>“各处边境均应设立鄂博,以清疆界。”<sup>[1]747</sup>并选择“妥干之人”管理。为了方便与廓尔喀的交往,在驻藏大臣衙门专门配置廓

尔喀文的翻译人员,“廓尔喀贡使往来,应酌派文武官员护送。”<sup>[1]755</sup>

经济方面:主要是体恤藏地百姓,禁止僧俗贵族在赋税、徭役方面对百姓过度剥削。“嗣后喇嘛番目人等私事往来,一概不得擅用乌拉,亦不许私发信票。”<sup>[2]800</sup>对西藏僧俗户口应行造册稽查,规定“各寨租赋应按年征收,清交商上,并查明逃亡绝户,随时豁免,以恤番民。”<sup>[1]754</sup>为了维护经济主权,在西藏开炉设灶,铸造正面印有汉字“乾隆宝藏”,背面印有藏文“乾隆宝藏”的银钱。

平定第二次廓尔喀战争是福康安杰出军事才能的体现。他的睿智、勇猛和不畏艰险最终赢得第二次廓尔喀战争的彻底胜利。乾隆皇帝对福康安平定廓尔喀侵藏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作为自己最得意的“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个,并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刻碑(《御制十全记碑》)纪念。此后半个世纪,廓尔喀一直谨守合约,纳贡称臣,与西藏地方保持和平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乾隆皇帝永靖边隅的目的;而制定影响深远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则是福康安政治才能和政治智慧的体现。善后章程不仅革除了西藏地方存在的一些积弊,完善了驻藏大臣体制,加强了清朝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对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此章程成为后来历代中央王朝治藏的重要依据,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此两项,奠定了福康安在历史上不朽的地位。

## 参考文献:

- [1] 方略馆. 钦定廓尔喀纪略[M]. 季垣垣,点校.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2]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 [3] 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三)[M]. 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1981.
- [4] 周霭联. 西藏纪游[M]. 张江华,季垣垣,点校.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5] 钦定巴勒布纪略[M]. 季垣垣,点校.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66.

责任编辑:骆晓会